

蔡运章 著

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

九二老人 顾廷龙题



(增订本)

科学出版社



1451030

蔡运章 著



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

九二老人 顾廷龙题

(增订本)



淮阴师院图书馆1451030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对甲骨文考释、洛阳北窑西周墓青铜器铭刻、三门峡虢国墓地、河洛文化与古史探微、古代钱币与货币史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集合。全书所收文章,思路开阔、见解新颖、资料丰实,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本书可供甲骨文、考古学、钱币学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骨文与古史新探 / 蔡运章著. —增订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03-033370-4

I. ①甲… II. ①蔡… III. ①甲骨文—研究—文集 ②金文—研究—文集
IV. ①K877. 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7201 号

责任编辑: 张亚娜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陈玉凤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谭 硕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0 插页: 1

印数: 1—1 200 字数: 711 000

定价: 1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蔡运章，1942年3月生，河南省洛阳市人。现任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洛阳易经学会会长、洛阳文物收藏学会会长、洛阳河洛文化研究会会长、洛阳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河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字学会副会长、《易学考古与中华文明丛书》主编、中国文物基金会修复与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中国先秦学会（原副会长）顾问等职。

自1964年5月到洛阳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以来，积极参加和主持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地、洛阳涧滨战国粮仓和韩都宜阳故城等重大考古项目的勘探和发掘。特别是长期以来，刻苦治学，潜心学术，在商周考古、甲骨金文、古钱币、先秦史和易学领域的造诣颇深，著术丰富，见解新颖，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多次获中国钱币学最高奖“金泉奖”。

主要著作有《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总纂）、《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合著）、《洛阳北窑西周墓》（合著），发表《空首布初探》、《商周筮数易卦释例》、《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起源》、《三星堆文化的太阳神崇拜》、《〈周易〉哲学的基本精神》等学术论文160余篇。

序

这是我第二次有机会为蔡运章先生的论文集作序。

蔡先生的第一部论文集《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是1993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我曾在小序中谈到，蔡先生治学的特点有二，一是重视考古与文献研究的结合，二是注意新发现材料的分析运用。《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其主题包括洛阳考古、历史的研究和都邑史、方国史，兼及古文字学、古钱学以及思想文化史等方面。范围之广阔，见解之新颖，已为读者所共见。

上述学术特点，是蔡运章先生多年治学的经历所决定的。他生长在洛阳，在本地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累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洛阳一带考古、历史的研究，自然是他的本色当行。他兼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由对古都洛阳的多角度、多层面研究，推及其他古代都邑、方国，取得了许多成绩。他又作为河南省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将研究延伸到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这就使他的著述不为单一学科所范限。

蔡运章先生的这部新编论文集《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可说是他的学术特点的进一步发挥，但内容的重点与《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颇有异同。

洛阳考古和历史的探索，仍然是论文集的主题。例如作为《洛阳市志·文物志》前言的《洛阳文物概述》一文，简赅扼要，使人们认识到洛阳文物考古成果的全貌。但《新探》中这方面的重点，是“洛阳北窑西周墓的研究”。北窑（旧写作“瑶”）西周墓，是继过去马坡等墓葬群之后的重大发现，对于西周考古有很高价值。蔡先生前一部论文集已有几篇文章涉及，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次又以较大篇幅系统地讨论，材料和观点都值得注意。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新发掘，是我国考古学史上又一大事。蔡运章先生依据文献，结合考古材料做了一系列讨论。其间关于虢国历史的整理叙述，不受一些流行说法的影响，平实可信，是很有贡献的。目前学术界对这处墓地的时代颇有争议。新发掘的大墓，或以为西周晚期，或以为东周早年，分歧的产生即和对虢国历史的不同理解有关。好在近年还有曲沃北赵晋国墓地的发现，其时代次第较为明确，可以当作虢国墓地年代的参照尺度。

古文字学、古钱学与思想文化研究的论文，在《新探》里所占的比例都比前一部论文集加大，而以古钱学更为突出。《新探》的“先秦货币研究”部分相当精彩，如

果大家知道蔡运章先生系《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的副主编，对此当不会感到惊奇。

空首布是《新探》论述的一个重要课题。若干年来的考古发现业已证明，平肩空首布的出土地点集中在洛阳一带。实际上，晚清杨继振已收得一大批空首布，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手录布上文字，与吴大澂、王懿荣等人论泉手札合装一册，题为《继幼云所藏空首布目》，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这批空首布传出河南，也肯定是洛阳一带的产物。《新探》就空首布有不少重要讨论，应当向读者推荐。

蔡运章先生还是洛阳易经学会的会长。他的《周易》研究，如《新探》所收诸文所示，是同河洛文化的探讨不可分的。尤其引人入胜的是《论河洛八卦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影响》一篇，又与他所擅长的都邑史研究联系起来了。

总之，《甲骨文金文与古史新探》和蔡运章先生前一部论文集一样，是以洛阳的发现和研究为核心，作多学科的发展扩充。洛阳一带古称“天下之中”，历代建都之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渊源，因此，蔡运章先生这部书内涵的丰富，是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的。

李学勤

一九九六年八月卅一日

于北京紫竹院

目 录

序	李学勤 (i)
---------	---------

第一篇 洛阳北窑西周墓研究

论洛阳北窑西周墓青铜器铭刻	(3)
洛阳北窑西周墓墨书文字略论	(32)
康伯壶盖跋	(40)
刺戈铭与术数崇拜	(43)
異卣盖跋	(46)
洛阳北窑西周墓发掘的重要收获	(49)

第二篇 甲骨金文与虢国史迹

论虢仲其人——三门峡虢国墓地研究之一	(63)
虢文公墓考——三门峡虢国墓地研究之二	(69)
虢硕父其人考辨——三门峡虢国墓地研究之三	(75)
虢国的分封与五个虢国的历史纠葛——三门峡虢国墓地研究之四	(80)
西虢史迹及相关问题——三门峡虢国墓地研究之五	(91)
释虢篇	(104)
释了篇——兼释甲骨文𠂔字	(111)
论太保玉戈铭文及相关问题	(115)
湖北随县新出铜器铭文补释	(122)

第三篇 河洛文化与古史探微

河图洛书之谜	(127)
河图洛书与古都洛阳	(133)

论原始洛书及相关问题——安徽含山出土玉版图和玉龟研究	(145)
论河洛八卦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影响	(166)
“水火不相射”新解	(184)
屈家岭文化的天体崇拜——兼谈纺轮向玉璧的演变	(188)
杜康造酒新论	(192)
冀州考辨	(199)
洛阳名称溯源——兼谈我国的三条洛水和两座女儿山	(204)
“居阳无固”新解	(209)
东汉永寿三年残碑跋	(211)
晋魏狼孟县省废年代考	(215)
唐咸通九年东都饥荒考	(220)
洛阳文物概述——《洛阳市志·文物志》前言	(222)
洛阳名胜碑文选录（四则）	(232)

第四篇 古代钱币与货币史研究

先秦货币导论	(241)
牲畜是中国最早的实物货币	(248)
中国古代玉币略论	(254)
论商周时期的金属称量货币	(262)
西周货币购买力浅论——兼谈西周物价的若干问题	(280)
谈偃师南寨村出土的西周铜铲	(290)
谈 1949 年以来空首布资料的新发现	(293)
空首布初探	(304)
洛阳附近出土的三批空首布	(330)
略谈宜阳王窑村出土的斜肩空首布	(344)
《春秋代布考》商榷	(352)
洛阳附近出土的两批东周货币	(355)
洛阳发现的空首布钱范及相关问题	(360)
楚国银币试探	(366)
见金钱牌研究	(374)
战国圜钱概论	(391)
秦国货币试探——兼谈布帛是我国古代的实物货币	(421)

东周王畿铸行的平首布和圜钱	(432)
论曹魏五铢钱	(439)
洛阳新发现的南宋出门锐银铤考略	(451)
也谈钱币上的君主崇拜意识——兼说东西方货币文化的特点	(456)
《洛阳钱币与河洛文明》序	(460)
附录一 思路广阔，见解新颖——评蔡运章著《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	杨升南 (464)
附录二 必前人之所未及就——谈《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	常耀华 (467)
后记	(471)

**第一篇 洛阳北窑
西周墓研究**

论洛阳北窑西周墓青铜器铭刻

1964~1972年，我们在洛阳老城东北2.5公里的北窑村西庞家沟发掘的367座西周贵族墓葬，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这里出土的59件有铭青铜（含少量铅）器，计有铭文50种，为研究西周王朝的历史及这个墓地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这些青铜器铭刻已陆续刊布25种，现谨就其中尚未刊布的青铜器铭刻的释读及其相关问题，略作论述。

一、青铜礼器铭刻考释

洛阳北窑西周墓共出土有铭青铜礼器31件，计有26种铭文，分别出自M1、M6（2件）、M37（2件）、M112、M299、M347、M352、M359、M368（3件）、M410（5件）、M418（4件）、M452、M686、M701等14座墓中。还从这个墓地采集到有铭青铜礼器6件，计有铭文5种。下面就其中尚未刊布的15种铭刻，试作考释。

（一）鼃鼎

1965年12月，我们发掘的M112出土有铭铜鼎1件，编为M112:2号。鼎的形制为纽耳直立，圆唇外折，口部稍敛，鼓腹圜底，三柱形足。颈饰粗壮的凸弦纹二周，器底及三足有较厚的烟炱痕迹。通高26.3、口沿高20.7、口径22.2、腹深11.5厘米，重3.85公斤。器腹内壁铸有铭文两行，共四字（图一）。其铭曰：

鼃乍（作）宝彝

“鼃”即蛛之别体，通作邾，为作器者私名。商周时的人名和国族之号往往无别，故“邾”亦可视为国族名。《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杜预注：“邾，今鲁国邹县也。”邾本颛顼之后，曹姓，武王时始受封，春秋时灭于楚，在今山东邹县东南。故此鼎当为邾国之君铸作的礼器。

邾国铜器屡见，多为春秋时器，鼃鼃鼎（《三代》3·23·8）、鼃眉父壶（《缀遗》13·12）或早至西周晚期。此鼎的形制、纹饰与西周前期的樊尹鼎相近^[1]，铭文书体亦具有西周早期的风格。该墓的形制为长4、宽3.1、深5.9米的中型长方竖井式，墓内出土的铜甬、铜戈等器，亦具有西周早期的特征。故此鼎的年代当不晚于昭王时期。这件铜鼎当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邾国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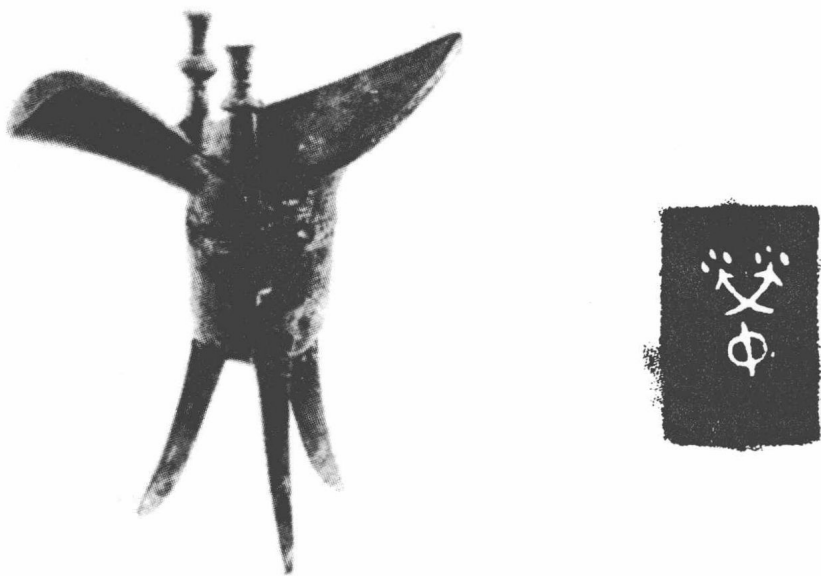
图一 鼃鼎（M112:2）及铭文

（二）荣仲爵

1965年10月，我们发掘的M299出土有铭铜爵1件，编为M299:1号。长流宽尾，深腹圜底，菌状柱，饕作兽首形。腹饰带状斜角云雷纹。足呈三棱锥体，尖向外侈。通高20.5、流至尾端长17.5、中宽7.8、腹深10.1厘米，重0.71公斤。腹外尾的下部铸有铭文“荣中”二字（图二）。

“荣中”是作器者，“荣”为国族名，“中”同仲，乃兄弟排行。荣本西周初年的姬姓封国。《国语·晋语四》载：文王即位后“重之以周、邵、毕、荣”。韦昭注：“荣，荣公”。可见从文王时起“荣公”就是与周公、邵公、毕公同列的参政大臣。《史记·周本纪》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这位在成王时任作册之官的“荣伯”，当是荣公之子。康王时的井（邢）侯簋铭：“唯三月，王令荣罍（暨）内史曰‘蕃（勾）井（邢）侯服’。”此铭“荣”可能就是“成王时的荣伯”^[2]。

荣国为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史记·周本纪·集解》引马融曰：“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潜夫论·五德志》也说：“周、吕、虢、吴……宫、密、荣，皆姬姓也。”因此，荣国贵族多为王室重臣，直到周厉王时仍“以荣公为卿士”，专揽朝中大权^[3]。



图二 荣仲爵 (M299:1) 及铭文

M299 是一座长 3.4、宽 2.3、深 6.8 米的小型长方竖井墓，墓中还出土有铜觚、铜害、玉圭等器。这些器物的形制、纹饰都显示出西周初期的特征，故此爵当为周初成、康时器。那么，此铭“荣仲”可能就是成王时作《贿息慎之命》那位“荣伯”的兄弟了。

(三) 肇簋

1965 年 12 月，我们发掘的 M352 出土铜簋残片 1 件，编为 M352:1 号。长 6.1、宽 4.4、厚 0.2 厘米。其上残存铭文三行共 10 字（图三）。其铭曰：

…肇乍（作）王母…

…用鬯（享）考吝（友）…

……□□朋吝（友）……

“肇”为作器者名，其上部左旁从户、右旁残存的当是攴，下部从聿，故它当是从攴、从聿的肇字。传世的散季肇簋铭曰：

佳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乍（作）朕王母叔姜宝簋，散季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薛氏》14.1）

我们认为，这位散季肇与此簋的作器者不但同名，而且同为“王母”作器，因此他们可能同为一入。

“王母”之称，还见于王母鬲（《积古》卷七）与



图三 肇簋 (M352:1) 铭文

帅佳鼎铭^[4]。《尔雅·释亲》谓“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郭璞注：“加王者，尊之也。”郝懿行《疏》云：“然则祖父母而曰王者，王，大也，君也，尊上之称，故王父母亦曰大父母也。”《礼记·曲礼下》：“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唐兰先生说：“金文罕见王母，此或生存之祖母之称，待考。”^[5]值得注意的是，金文所谓“王母”，并非一般人之“祖母”，而是指“皇祖妣”而言的。这由王母鬲的作器者为周王、帅佳鼎的作器者为“周公孙”可知，“王母”本是西周王朝高级贵族对其祖母的尊称，最初并非一般庶民百姓所敢僭越的。故此簋的作器者“肇”，也当是西周散国的贵族成员。

M352 是一座长 3.5、宽 2.1、深 7 米的小型长方竖井墓，因该墓被盗严重，墓内除发现铜马衡和铜泡外，随葬器物多被洗劫。从此簋铭文书体和散季肇簋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后段（或稍晚）看，这件铜簋的年代似当定在西周中期后段（或稍晚）为宜。

（四）乍豉豆

1965 年 12 月，我们发掘的 M359 出土铜豆形器 1 件，编为 M359:1 号。它形似铜豆，口呈方形，浅腹，平底，喇叭形圈足。盖与器体相同，顶有喇叭形握手。圈足与握手上有一相对应的长方形孔，可供穿系。出土时器内残留有朱色颜料痕迹。通高 8.6、口高 6、腹边长 8.6、盖边长 9.1、腹深 3.4、壁厚 0.2 厘米，重 0.55 公斤。盖顶握手上铸有铭文“乍豉”二字（图四）。



图四 乍豉豆（M359:1）及铭文

“乍”同作，末一字范铸模糊，从其残形看，左旁似豆字上半；右旁似支之上半，故疑其当为豉字。豉同豉，金文所未见。甲骨文豉作（《京津》四四六二），战国印文作^[6]，均从豆从支。甲骨文豆作（《乙》七九七八），蒸字所从之豆作（《佚》六六三），金文豆作（宰甫簋）。此字左旁上部一圆点，与宰甫簋豆字上部一点相同，下

部残留与甲骨文豆字上部构形相类；右旁残存之支，与战国印文𣎵字右旁相似。故此字从豆、从支，当是𣎵字无疑。

这件方形似豆的小型铜器，在以往的著录中未曾见过。𣎵，通作豆。《说文·殳部》：“𣎵，𣎵击也。从殳、豆声。”《集韵》：“𣎵，大透切，音豆。”故“𣎵”可读如豆。《说文·豆部》：“豆，古食肉器也。”《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郭璞注：“豆，礼器也”。豆本为盛放肉酱、腌菜和调味品的器皿，多以陶、木制成，到商代晚期出现作为礼器所用的铜豆。然商周时的豆盘多为圆形，到春秋晚期才出现器腹大体呈方形的铜豆。此器依其自铭当称之为豆，从器内残存的朱色颜料看，似用为调色器。

该墓长 5.7、宽 3.3、深 6.2 米，属中型竖井墓。从墓内出土的陶器看，此墓的年代当为西周中期穆、恭时期。这件小型铜豆为西周青铜礼器增添了新的品种。

（五）白丰爵

1965 年 12 月，我们发掘的 M368 出土有铭青铜器 3 件，其中的白丰爵，编为 M368:4 号。它的形制与荣仲爵基本相同，唯腹部饰带状月牙纹，云雷纹衬地。通高 20.5、流至尾端长 14.7、中宽 7.4、腹深 9.4 厘米，重 0.65 公斤。腹内近口处铸有铭文“白丰乍彝”四字（图五）。



图五 白丰爵（M368:4）及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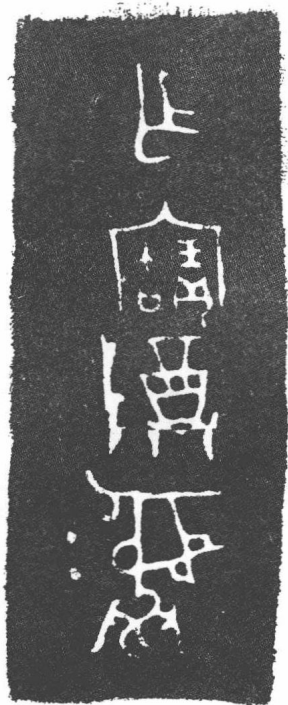
“白丰”是作器者，“白”同伯，是其兄弟排行，“丰”乃其私名。1976 年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丰壶、丰爵、丰尊诸器^[7]。其中的丰尊铭云：

唯六月既生霸，乙卯，王在成周，令丰窳（殷）大矩，大矩锡丰金贝。
白丰爵的形制与丰爵相同，“丰”曾在成周（洛邑）受周王赏赐，故“白丰”与“丰”当为一人。可见，白丰爵在洛阳西周贵族墓地出土，绝非偶然的事。

该墓为长4、宽2.64~2.84、深7.2米的小型墓葬，墓内除白丰爵外，还出土有异卣盖、乍宝隤彝尊等器，均具有西周前期器物的特征。丰壶诸器的年代属穆王时期，故白丰爵也当属穆王时器。

（六）乍宝隤彝尊

M368 还出土有铭铜尊1件，编为 M368:3 号。为侈口鼓腹，圜底圈足。颈、足部各饰凸弦纹二周，腹前后对饰羊首一个。铸作精工，质地厚重，通体布满孔雀蓝色锈。通高19.8、口径19、底径13.6、腹深15.9厘米，重2.71公斤。器腹内底部铸有铭文“乍宝隤（奠）彝”四字（图六）。



图六 乍宝隤彝尊（M368:3）及铭文

这件铜尊的形制与成王时的鬯尊相同，纹饰与洛阳出土穆王时的競卣相类^[8]。该墓出土的异卣盖也具有穆、恭时的特征^[9]。故这件铜尊的年代，也不会晚于穆、恭时期。该尊铭文没有作器者的名字，因而这件铜尊可能是送葬时临时从市场上买来，赠送给墓主人的馈赠礼品。